

《徐忠勤公遗集识后》及其文献价值

王云 崔建利

一、《识后》写作背景及版本状况

《徐忠勤公遗集识后》(以下简称《识后》)是我国近代藏书家徐坊之子徐锺葳为徐坊作品集写的一篇序跋性文字。徐坊(1858—1916),字士言,又字矩庵,号梧生,又号蒿庵,山东临清人。生于宦宦世家,年少时纳赀为户部主事。后得尚书荣庆推荐,超擢国子丞。徐坊一生饱读诗书,同时又嗜书如命,其居京书室“归朴堂”藏书甚丰,是当时一位颇负盛名的藏书家,在读书人中间很受尊重。宣统元年(1909),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成立,当时著名藏书家缪荃孙和徐坊被分别任命为正、副监督(相当于正、副馆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坊“旬日连上五封事,俱不报”^①,随后弃官在家。1913年9月,他在清帝退位后进身小朝廷,获御前进讲资格,给博仪讲授十三经。1916年8月30日徐坊病逝,溥仪追赠其为太子少保,谥“忠勤”,其作品结集为《徐忠勤公遗集》。

《识后》一文写于1922年(民国十一年),即徐坊去世之后六年。关于此文的写作背景及目的,徐锺葳在文中有如下叙述:

岁壬戌(民国十一年),吾父官少保临清徐忠勤公歿后之六年,锺葳哀集遗诗得若干首,又词数十阙,都为一编,请于故旧长者。行将付梓,因思吾父一生忠孝艰苦卓绝,不可不缅述,所以以见。

今此文既成,将焚于墓,以告吾父。所以必于墓者,穷思所往,谓父之在是也。迨既焚之后,不揣冒昧,即以附诸简末。

无论从题目还是从这两段文字看,《识后》应是附于《徐忠勤公遗集》之后的一篇跋文。而笔者所见到者,是现藏国家图书馆的《识后》线装单行本,封面留有液体浸渍过的痕迹,但内页洁净平整,未受影响。在国家图书馆书目信息上,于此书版本项著录为“刻本”,但从版面及字体特征看,很像民国年间较通行

^①柯劭忞:《徐忠勤公墓志铭》,见《潍县志稿》卷三二《人物·侨寓》。

的仿宋铅字排印本。开本为25×14.5厘米,正文(含柯昌泗^①弁言)共9页18面,每面(半页)11行,行30字,个别时间和人名注释用双行小字,全文近6000字。封面为“石门山人”题签,扉页书名及“壬戌春日”四字为徐锺藏自题。

徐坊虽是一位饱学之士,且藏书甚丰,但非科举出身,平生少著述,故学术影响不大,其子徐锺藏更谈不上什么学术成就,所以《识后》这本小册子印行之后或许并不为人所注意,各类文献也少见著录,对徐坊藏书多所关注或颇有研究的学者如罗继祖、刘乃和、王绍曾、沙嘉孙等在相关著述中均未曾提及^②。特别是刘乃和和罗继祖,生前都在著名高校任职,专注学问,平生所见典籍无数,也曾对与徐坊有关的文献资料十分关注,且前者系徐坊外孙女、徐锺藏外甥女,后者为罗振玉之孙,他们离徐坊时代不远,都有与徐锺藏同时代生活的经历,他们两位最有可能也最应该见过此文献,但二位学者在其相关文章中均未提及《识后》一文,可见这本小册子印行后极少流布。王绍曾、沙嘉孙合著《山东藏书家史略》之重要特点是于每位藏书家传后详列文献资料来源,使本书颇具资料价值。其中于徐坊传后列出从《清史稿》到沙嘉孙《徐坊和他的归朴堂藏书》在内的21种相关文献,其中也未提到《识后》一文。笔者以偶然方式得知国家图书馆藏有《识后》一册,此后遍查国内各大图书馆藏书信息和书目均未见著录,据此推测,国图收藏的这本《识后》很可能已成孤本。为此,笔者专程进京借读,阅后深感此文对徐坊的深入研究大有裨益。

二、关于“石门山人”

《识后》封面题签者“石门山人”究竟是谁呢?据笔者考证,当时以“石门山人”为号且都有可能与徐坊交往者有两位,一位是李绍棻(1849-1924),字馥廷,湖北安陆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吏部主事、郎中、陕西按察使等。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曾因护送光绪、慈禧西行有功,升至陕西巡抚,护理甘、陕总督印,加恩赐大学士衔,兼代内务总管大臣,优予直奏对。两宫回朝前,慈禧本欲正式升其为陕甘总督,却被勒贿而未遂的悼亲王奕踪参奏,回朝后竟被罢官归里。从李绍棻仕历及其曾参与护驾西行来看,他与徐坊认识并交往的可能性很大,但未见二者交往的相关文献。再者,徐锺藏写成并印行《识后》时李绍棻早已身居湖北,且已是垂暮之年。综合以上情况来

①柯昌泗:柯劭忞之子,近代金石学家,著有《语石异同评》等。

②据笔者所知,相关著述有:罗继祖的《中国藏书家不能忘记徐梧生先生》(《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五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刘乃和《藏书最好的归宿——陈垣书的捐献与徐坊书的散失》(《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3期),王绍曾、沙嘉孙《山东藏书家史略》(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沙嘉孙《徐坊和他的归朴堂藏书》(《文献》1987年第3期),王庆祥《溥仪交往录》(东方出版社,1999年),杜泽逊、程远芬《山东著名藏书家》(《齐鲁文化丛书》本,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

看,李绍棻题签的可能性不大。

另一位是徐世昌(1869—1943),字卜五,号菊人,又号东海、弢斋、水竹村人、石门山人等,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生于河南汲县。1879年徐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中华民国总统。徐氏博学多才,能书善画,曾荣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有“总统诗人”之称。从1910年9月任体仁阁大学士起,他便邀集其幕僚、门客进行清诗总集《晚晴簃诗汇》的编写,至1929年完成。徐世昌一生与徐坊关系甚密,且认徐坊为同宗兄弟:“余家世出中山王,忠勤始祖为中山王之兄,余与忠勤叙兄弟行。”^①徐坊去世后,徐世昌对其后事多有关照,并对徐坊之子徐锺藏每每给予长辈的抚慰和教诲,对此,徐锺藏在《识后》一文中也多有提及:

柯丈且为撰墓志,陈弢庵太傅与吾家三世相知,夙重公之为,人因复为之篆盖。吾宗太傅为之书丹,以旄耄大年,钧衡重任,犹且闭户为之作小楷,累日不息。锺藏每往谒见,辄教以立身处世之方,娓娓不倦。惜锺藏愚蠢无知,迄未克有所树立。又常谓:“余与汝父相见之初,汝父与汝年相若,三十年布衣之交,往来无间,直有如亲兄弟者,矧曾叙及皆为中山武宁王之后裔乎!矩意中途分手,谁与共叙幽情?”余不免悽怆于怀,诗以志感。其后忆公又有“子期不可作,凄绝伯牙琴”之句,其思念故旧之情可以见之于语言文字之间矣。交情若此,是知锺藏年来之所以托身于太傅之门为太傅累者,非无故也。

这里的“吾宗太傅”即指徐世昌。徐世昌尽管一度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但他潜意识中始终视清廷为国脉正统,清廷逊位后仍能享受优厚待遇,其中就有徐世昌的功劳。这使得逊位清廷在很大程度上将徐世昌视为自己人或复辟帝制的希望。1913年,逊帝溥仪封徐世昌为太傅,且著加恩赏戴双眼花翎,希望能抓住一根复兴清室的稻草,但徐氏最终还是“以清太傅而仕民国”。徐锺藏在文中之所以称徐世昌为“太傅”而不称总统,体现了视清廷为正统的保守意识。徐锺藏写成并刻印《识后》一文是1922年春天,此时徐世昌仍在京当总统(1922年6月被赶下台后归隐天津),他们关系又如此亲密,所以,徐世昌为《识后》封面题签的可能性最大。另外,笔者还将题签字(楷体)与现存部分徐世昌书法作品(多为行书)进行了对比,发现署名中“石”字颇显徐氏风格。综合以上条件来看,这里的“石门山人”应为徐世昌。

三、《识后》之文献价值

仅就徐坊研究来看,《识后》一文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或线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见徐世昌主编:《晚晴簃诗汇》卷一八〇徐坊小传。

第一,徐坊思想倾向暨品行。

徐坊生活的晚清,正经历着由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社会的转变。同当时诸多晚清遗老一样,徐坊的心态是痛苦复杂的。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教化,使徐坊骨子里浸透着一股浓浓的忠君保国情结,同时,面对废除帝制的滚滚洪流,他的内心也充满了恐惧和无奈。所以,徐坊一方面笃于忠孝节义,一方面却又颇显超脱和与世无争,传统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双重个性在他身上得到较好的体现。他曾在一首诗中曰:“浊世悠悠四十年,既愚且鲁得全天。”^①虽系自嘲,却很能体现“浊世”中的徐坊所曾具有的心态及思想倾向。现存直接介绍徐坊思想倾向暨生平行迹的文献非常有限,其中主要是柯劭忞所撰《徐忠勤公墓志铭》^②以及在此基础上删节或改写而成的《清史稿》“徐坊传”。《识后》虽是一篇跋文,但重点是对徐坊生平行迹暨思想倾向的回顾及从中流露出的那份浓浓的怀父之情。无论历史或后人对徐坊当时的行为心态作如何评判,但在徐锺葳的心目中,父亲徐坊既是一位孝子,又是一位忠臣,还是一位贤士。

对于徐坊之孝,《清史稿》曾这样记述:

光绪十年,法陷谅山,延旭逮问,下刑部狱。坊侍至京师,入则慰母,出则省延旭于狱,囊馐之事,皆自任之,布衣蔬食,言辄流涕。延旭戍新疆,未出都卒,坊扶柩归葬,徒行泥淖中,道路叹为孝子。

《识后》一文则对此增添了更多细节,作了更为详细的记述:

谅山不守,中丞公(按:指徐坊之父徐延旭)引咎自劾,奉严旨逮问。维时公方弱冠,随侍中丞公于清室纳橐馐焉。中丞公已构沉疴,公拊摩抑搔,曲意调护,多方宽譬,以慰忧心。夜眠仅一坑,狭甚。中丞公每睡酣,覆足之被辄委公身上,公屏息不敢少动,又多蚊蚋虬蝨之属,亦不觉其苦。衣敝,每不更易,都忘寒燠。锺葳有两兄尚在襁褓,皆染时症,且死,公未尝抚视,遂皆殤去,亦不暇痛惜也。中丞公本亡愧怍,虽惶悚,心实澹然。见公如此,每慰藉之。中丞公奉命戍新疆,公呈请侍父戍所。时吾伯仲两姑母皆已嫁,远在临清,叔季两姑母暨吾叔俱幼弱,两兄新死而锺葳未生也。公乃嘱吾母善事廉太夫人,涕泣而去。甫出门,中丞公病笃,遂卒于旅舍。公扶柩徒行于泥淖之中,返葬潍县。

面对年迈的母亲,徐坊同样是孝顺十足,《识后》一文对此作了多角度展示。请看下面一例:

中丞公既葬,奉先王母廉太夫人侨居京师,仰承色笑,未尝少有倦意。事无大小,必禀命而行。廉太夫人每怒,辄与吾母鹿夫人长跪以请,怒不解

①徐坊为自藏明万历十九年刻《倪雲林詩集》題詩,見杜澤遜、程遠芬《山東著名藏書家·徐坊歸朴堂》插图。

②見《濰縣志稿》卷三二《人物·僑寓》。

不敢起也。廉太夫人构危疾，颇殆，公素知血肉之品为滋阴良剂，弥留之际，公皇遽不知所为，遂沥血纳口中，冀奏殊功。何期天意难回，毫无所效。无论是置病危幼子于不顾还是沥血救母，都体现了徐坊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教化的封建士子所具有的那份浓重孝心。除上面所引两段，《识后》还详细记述了徐坊在父亲去世后承担起家庭重任的经历、事迹。为了替父亲选择一处合适的墓地，徐坊“乘马踏勘者，经一载有馀，始行择定”，对此徐坊曰：“余非惑形家之言也，不过欲求既无风水之患，日后又或不至有驻兵治路导河筑城之事，使先人窀穸永奠，为人子者略尽心耳。”

关于徐坊之忠，柯劭忞在《徐忠勤公墓志铭》中有如下记述：

宣统三年，武昌兵起，京师震动，公慨然有殉国之志。旬日速上五封事，俱不报。洎今上巽位，公弃官侨寓京师，闭门谢客，然忧伤憔悴，未尝一日忘国事也。召为毓庆宫行走，公叹息曰：“异日为陆丞相者，其我乎！”这里的陆丞相指背负偏安小皇帝投水而死的南宋大臣陆秀夫。面对偏安清廷，徐坊将自己比喻为陆秀夫，忠臣之心可见一斑。这段引文简明扼要，省略了许多细节和史实。比如徐坊的“慨然有殉国之志”，《识后》文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公又虑世风日变，不知其极，遂慨然有徇（按：此字从原文）国之志。京师井制率皆以石凿小孔，仅容一绠之汲。太学有井，公密使匠人扩而大之。锺藏常侍左右，时方童骏，亦不解其所为，今始憬然。”可见，面对不可阻挡的废除帝制风暴，徐坊随时准备跳井自杀以示对偏安小朝廷的忠义。现在看来，这种思想意识和行为显然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的，但对于徐坊当时的身份处境及其所受的传统教育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再比如武昌事变后徐坊“闭门谢客，然忧伤憔悴，未尝一日忘国事”之具体情形，《识后》也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伏见皇上且富于春秋，圣躬暇豫，学以日隆，公乃即日去官，闭门谢客。公本素寡交游，然与人和而不同，亦无所忤。所守确然，一生未尝少有移易。至是极厌尘嚣，直不欲与世人通闻问。辄与陈弢庵太傅（陈太傅宝琛别号弢庵）、伊尔根觉罗寿民少府（伊尔根觉罗少府耆龄字寿民）、宗室瑞臣官保（宗室官保宝熙字瑞臣）、劳玉初尚书（讳乃宣）、张小帆中丞（讳曾敷）诸丈作诗倡和，多缠绵悱恻之词。

此外，《识后》所记徐坊临去世前对小皇帝溥仪学行的关心及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一份遗憾和自责，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小朝廷的一片赤诚之心：

濒危之前三日，公犹眷恋冲圣不已^①，把观篆书宸翰，不忍释手，泣数行下。时冲圣甫学篆于公，聪明天亶，已能心知其意故也。因口占绝句一首曰：“久视妻孥敝屣轻，君亲未报愧平生。只余心似团栾月，万古长悬自在明。”

饱读诗书之外，徐坊对医学也颇有造诣，而且屡屡抚恤贫穷乡邻，“戚里之

^①冲圣：年幼的君主，此指溥仪。

贫乏者，辄赙恤之”，体现了徐坊作为孝子忠臣之外的另一面——贤士风范：

公又邃于医学，贫窶不能得医药者多所矜恤。每疫作，得公方服之立效，活人甚众。

徐坊一生嗜书如命、经纶满腹，系人所共知，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邃于医学”，这应该是《识后》一文提供的有关徐坊生平的一个重要内容。笔者在归纳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有关徐坊藏书时，曾注意到这些藏书中有很多医学书籍，当时曾不解地视其为徐坊藏书特色之一，现在看来，这应该和徐坊“邃于医学”有直接关系。可见，因用而藏，是徐坊藏书行为中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倾向。

第二，徐坊藏书。

徐坊对后人影响最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学问，也不在于政绩，而在于他的藏书。傅增湘在《双鉴楼善本书目序》中曾赞其藏书曰：“当其盛时，家富万签，駉駉与南瞿北杨齐驱并驾。”仅就傅氏《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所录徐坊、瞿、杨三家藏书数量对比看，傅氏所评并非溢美之辞，因此，称徐坊为近代著名藏书家并不过分。不过，如上所述，徐坊除了在维护传统礼教及王朝正统方面极显人世之外，其他方面则颇显超脱，这种看似消极的无为心态较为明显地表现在其藏书行为上。一方面，他很少张扬自己藏书，“严扃深鐍，秘不示人”^①，另一方面，他也很少在自己的藏书上面题字、盖章和题写序跋。作为藏书家来说，能做到后面一点，未尝不是一种超然的境界。但这却给后人的研究带来相当大的困难，这也是徐坊在藏书家中不甚显名的重要原因。直到山东大学沙嘉孙先生穷搜博采，成《徐坊和他的归朴堂藏书》一文，对徐氏藏书作了较全面梳理，徐坊藏书之大体状况才渐为今人所知。《识后》一文重在叙述徐坊生平，涉及徐坊藏书的文字不多，其中有一段文字揭示了徐坊在八国联军进京时期藏书散失状况，颇具资料价值，为前贤所未曾注意，兹录如下：

庚子之乱（光绪二十六年），书数万卷赘如也。其有因乱存诸典肆者，乱后悉失去。中有宋拓《石鼓文》二本，登来故非綦贵，浸为瓌宝。其后一归宗室瑞臣丈，以珂罗版精印行世，且乞公记其原委于后；一归丹徒刘氏（刘氏鹗，字铁云），遂不能复见。又有明拓一本，并归刘氏，世上亦有印本。举凡失去之书，或可得而知欤？或不可得而知欤？要之，锺藏则有所不得悉知也。公深引此以为憾事，每曰：“九庙犹且震惊，遑虑及此？”若无人道及，公辄隐忍不言，然其沉痛在心可以想见。家有藏弃而逢乱世，亦可伤也。其遗书之在定兴者，至今尚存。

《石鼓文》文字为大篆，形体特征独特，书法古茂遒朴。徐坊好书法，且精于籀篆，其子锺藏也好书法，而《石鼓文》自唐宋以来为擅长篆书的书法家所尊崇，特别是清代后期“碑学”兴盛，《石鼓文》书法影响更是空前广泛，徐坊视所藏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一。

宋拓《石鼓文》“为瓌宝”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许是徐锺藏于数万卷损失中独提及《石鼓文》的一个重要原因。《石鼓文》目前可见最早拓本以天一阁藏北宋拓四百二十二字本为最。徐坊所藏是否出自天一阁本无考,但1916年,有正书局出版刘鹗藏天一阁本宋拓《石鼓文》,很有可能就是从徐坊藏书中散出者。

第三,徐坊著作。

关于徐坊著作,《清史稿》及《徐忠勤公墓志铭》均未提及。《徐忠勤公遗集》之名见于《潍县志稿》徐坊传末:“所著曰《徐忠勤公遗集》”。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徐坊》小传中则称徐坊“有《徐忠勤公遗诗》”。王绍曾、沙嘉孙《山东藏书家史略》则称:“所遗诗文词集若干卷,曰《徐忠勤公遗集》未刊行。”王庆祥在《溥仪交往录》中认为“徐坊健在时未编文集传世,但有诗稿和若干书札遗存,尚在后人手中。”^①以上是笔者所能查到的关于徐坊遗作的几种说法。看来,称徐坊遗作为《徐忠勤公遗集》是没问题的(徐世昌称《遗诗》可能和他汇编清代诗词有关),关键问题有二,一是《徐忠勤公遗集》之内容究竟是怎么样的,二是究竟有没有被刊刻行世。这两个问题在《识后》一文中都可找到答案或线索:

吾父官少保临清徐忠勤公歿后之六年,锺藏哀集遗诗得若干首,又词数十阙,都为一编,请于故旧长者。行将付梓,因思吾父一生忠孝艰苦卓绝,不可不缅怀,所以以见。

继思吾父一生心血,只文数十篇,诗若干首而已。文多散佚,正在搜寻;诗则多有稿,釐订付梓不容稍缓。毕此二事,锺藏即随侍吾父于地下,尚可腆颜相见。

从这两段引文看,《遗集》中主要是诗和词,似乎不含文。而其中主要是诗(广义的诗也包含词):

兹述吾父自少至老生前身后之事颠末如此,以著吾父之令德。至于诗之如何,识者能辨,固不可待赘言,要非锺藏所能窥知、所敢妄言者。然亦有可知者,在吾父为诗逾三十年,功夫不为不醇,而又一生忠孝,笃于手足之情,朋友之谊,故其诗多思亲忆弟爱君怀友之作,寻绎于字里行间,自能领会其意,乃发诸天性之自然,毫发不容假借。言为心之声,有诸中乃形诸外。作为诗文乃其余事,所重者在彼不在此也。后世读是编者,若只知尊重其诗抑亦未矣。吾父岂徒以诗文名世者哉!

柯昌泗在为《识后》所写的《弁言》中也有“遗诗”之说:

公歿之后,公之子锺藏将梓遗诗,拟就《识后》之文一篇以示昌泗。可见,所谓《徐忠勤公遗集》,亦可称“徐忠勤公遗诗”。估计徐世昌可能见过《徐忠勤公遗集》刻本(或排印本),因为他称徐坊“有《徐忠勤公遗诗》”,更

^①王庆祥:《拔了眉寿的师傅:溥仪和徐坊》,见《溥仪交往录》,东方出版社,1999年。

可能是针对已出版印行后的作品集而言(而不是对参差散乱的手稿)。他之所以称“遗诗”而不称“遗集”,除了和他当时正在汇刻清诗有关外,大概主要因为徐坊遗著结集刊本中大部分是诗的缘故。

第二个问题,《徐忠勤公遗集》究竟有没有被刊刻。从《识后》一文的写作目的及上述诸引文看,作者是在准备印行父亲遗作,但至今未见有印本(或稿本)传世。就连本应在《徐忠勤公遗集》中见到的《识后》一文也是单行本传世。笔者认为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徐忠勤公遗集》被刻印(或排印)后发行不广,且时局动荡,书已失传(或徐坊后人手中尚有存本?待考),这种可能性较大;另一种可能是,虽然徐锺藏准备将其付梓,但由于意外事变未能刻(印)成,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就《识后》一文所流露的怀父情感来看,假如真是由于意外原因导致徐坊遗集无法刊刻行世,徐锺藏应该不会只将这篇跋文单独刊印。

当然,以上两个问题中的或然结论,只是笔者推测,正确与否,尚待进一步考证或《徐忠勤公遗集》刻本(或排印本)被发现。

作者工作单位:聊城大学图书馆

书讯: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

方建新编。精装 16 开,定价 298.00 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 6 月出版。

本书收录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公开发表出版的宋史研究论文与著作 40000 余条,是已知世界范围内收录宋史论著最全的一部目录。